

2008年

经济与贸易评论

第①①辑

Review of Economy & Trade

- 柳思维：肃清封建残余思想影响 推动中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 周光友：电子货币发展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 王德章 李 龙：加快发展服务业 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结构优化
- 李陈华：消费者偏好异质性与渠道竞争——一个直销-零售双渠道价格博弈模型
- 张立光：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经济影响的经验研究
- 郭 妍 徐向艺：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实证分析——基于山东省的视角
- 罗建兵 许敏兰：产品内分工模式下中国产业升级的困境与突破——基于玩具出口的经验研究
- 赵 玻：主导零售商顾客锁定折扣的竞争效应及政府规制取向——以会员积分卡为例
- Zhiqi Chen 著 胡德宝 译：主导零售商与抗衡势力假说
- 零售上市公司最新排名：美国、英国、加拿大
- 附录：国际学术动态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2008年

经济与贸易评论

第 1 辑

Review of Economy & Trade

主 编 柳思维
副主编 李陈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与贸易评论·第1辑/主编柳思维;副主编李陈华.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10

ISBN 978-7-81138-158-0

I. 经… II. ①柳…②李… III. ①经济发展—文集②商业经济—经济发展—文集 IV. F21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62843号

经济与贸易评论·第1辑

主 编 柳思维

副主编 李陈华

责任编辑:李霞湘

封面设计:杨红鹰

责任印制:封俊川

出版发行: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55号)
网 址:	http://www.xcpress.net
电子邮件:	xcpress@mail.sc.cninfo.net
邮政编码:	610074
电 话:	028-87353785 87352368
印 刷:	四川森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80mm×255mm
印 张:	10.7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500册
书 号:	ISBN 978-7-81138-158-0
定 价:	22.00元

1. 如有印刷、装订等差错,可向本社营销部调换。
2.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录

肃清封建残余思想影响 推动中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 柳思维 (1)

电子货币发展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周光友 (18)

加快发展服务业 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结构优化 王德章 李 龙 (39)

消费者偏好异质性与渠道竞争

——一个直销—零售双渠道价格博弈模型 李陈华 (50)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经济影响的经验研究 张立光 (71)

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实证分析

——基于山东省的视角 郭 妍 徐向艺 (82)

产品内分工模式下中国产业升级的困境与突破

——基于玩具出口的经验研究 罗建兵 许敏兰 (93)

主导零售商顾客锁定折扣的竞争效应及政府规制取向

——以会员积分卡为例 赵 玻 (106)

主导零售商与抗衡势力假说 Zhiqi Chen 著 胡德宝 译 (118)

零售上市公司最新排名：美国、英国、加拿大 (138)

附录：国际学术动态 (151)

肃清封建残余思想影响 推动中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

柳思维

摘 要：历史上中国古代民主、法治文化遗产短缺，封建专制思想积弊甚深；肃清封建残余要重点突破特权观念、官本位思想、人治意识束缚；要准确完整领会邓小平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思想，加大制度创新，推动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关键词：肃清；封建残余；推动；市场经济；发展

当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列车刚刚启动的时候，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即破除封建残余思想的问题。1980 年 8 月 18 日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谈话中，就对特权、家长制、官本位等封建思想残余进行了深刻剖析，并将其作为一个主要部分集中进行阐述。今天，当我们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推向新阶段的时候，如何防止封建残余思想扭曲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何注意防止出现封建权贵资本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扭曲已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这是坚持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好的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更应是新一轮思想解放的重点问题。对此，

作者简介：柳思维（1947 - ），男，湖南岳阳市屈原行政区人，湖南商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经济与贸易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湖南省院士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liusw@vip.163.com。

我们学术界更应当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去关注和探讨。

一、中国古代历史上民主、法治文化遗产短缺要求 更重视破除积弊甚深的封建残余思想

清除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对于中国更好地吸收人类历史中的先进文化和世界文明进化中的积极成果,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加速整个国民精神的现代化和加快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尤其特殊的重要意义。从历史上看,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漫长,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统治思想长期禁锢和奴役人们的思想。与西欧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古代历史上缺乏民主管理与法治管理的机制,哪怕是形式上的民主都没有,民主管理及法治的优秀文化遗产十分短缺。

(一) 与西方的奴隶制时代比,中国奴隶制时代未产生民主管理与权力制衡机制

古希腊与中国同属文明古国。在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在尚未产生国家的荷马时代,古希腊城邦部落的管理中就出现了原始军事民主机制的雏形,即由部落酋长、议事会、民众会互相制衡的管理机制。酋长是公举出来的部落领袖,平时管理祭祀、裁决争讼,战时统率军队。议事会由氏族长老会组成,所有重大问题先由议事会讨论。民众会是城邦部落的最高权力机构,由部落全体成年男子组成,对作战、媾和、选举部落领袖等重大问题进行表决,具有选举权,由声音的大小决定投票结果。^①

到了奴隶社会,希腊奴隶制民主管理机制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四权分立与制衡的一种管理机制。古希腊斯巴达的国家管理机构由“国王—长老会—公民大会—监察官”组成。国王是最高行政官,分别由两个家族世袭。设两个国王:一个国王在和平时领导祭祀活动及裁决奴隶主内部纠纷;另一个国王在战时统帅军队,集中掌握军事活动权力。长老会则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由30人组成,除两个国王外,其余成员都是年龄超过60岁的贵族。长老会成员实行终身制。所有国家重大事件都由长老会讨论决定,所有案件都由长老会审理。公民大会由年满30岁的斯巴达男子组成,主要选举长老会成员和监察官,对长老会提议

① 崔连仲. 世界通史: 古代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194.

无权讨论，有表决权，表决结果由呼喊声高低决定。监察官设5人，由公民大会一年一选，凡年满30岁公民均可参选。监察官的职责是监督国王，审理国王不法行为，监察公民生活和镇压被统治者的反抗。^①到公元前8世纪左右，希腊雅典国家产生，国王被执政官所代替。最初执政官是终身制，后改为10年一任。公元前683年，执政官改为1年一任，由过去1人增为9人（即首席执政官、王者执政官、军事执政官各1人，司法执政官6人）。执政官从贵族中选举，卸任后为贵族会议成员。贵族会议系最高的监察与审判机关，有权推荐和制裁执政官，并审理刑事案件。公民大会只有占有土地的贵族才能参加。

古希腊的奴隶制民主管理在运行中也在不断改革和完善。公元前592—公元前591年，执政官梭伦为了缓和平民与奴隶主贵族的阶级矛盾，进行了著名的“梭伦改革”。他修改了宪法，规定全体雅典自由民不论贵族或平民，一律按财产多少分为四个等级，并削弱了贵族长老会的权力，加强了公民大会的权力，规定各等级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决定国家大事，并选举官员。梭伦还成立了两个新机构，即400人会议和陪审法庭。400人会议为公民大会准备议程，预审提交公民大会的决议。陪审法庭的陪审员从四个等级的公民中选出，参与审判，接受上诉案件。^②梭伦在公元前6世纪进行的改革已经过去了2400多年，但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古希腊的奴隶制城邦走到极盛，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也达到高峰。伯里克利时代^③承认公民一律平等，公民有平等权利来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执政官和几乎所有官职对所有等级的公民都是开放的，都可通过抽签当选；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每十天召开一次会议，实行直接民主制，凡年满20岁的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可在会上审查批评官员，决定重大问题。最高权力机构为将军委员会，由十名将军组成，设首席将军，由公民委员会通过举手表决选出。同时法治也在完善，陪审法庭是最高司法与监督机关，拥有6000名陪审法庭法官，法官由公民抽签选出，分到10所法庭，平均每所法庭500多人，负责审理重要案件。^④希腊雅典时代的奴隶主民主与法治管理达到令人

① 崔连仲. 世界通史：古代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01.

② 崔连仲. 世界通史：古代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95-205.

③ 公元前443年到前429年伯里克利任首席将军时，史称“伯里克利时代”。

④ 崔连仲. 世界通史：古代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17-219.

惊叹的高水平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制度有关。当时的雅典农业方面是小土地所有制占优势，手工业中也是小作坊小业主占优势，他们必然在政治上要求民主管理。

除了古希腊外，古罗马早在“王政”时代就有“军事民主制”，形成了“人民大会—长老院—国王”的运行机构。人民大会或库里亚大会由全体成年男子组成，议事投票以库里亚（罗马大氏族，由十个氏族组成）为单位，有权通过或否决一切法律，选举公职人员，决定战争和审判重大案件。元老院即长老议事会，由300个氏族长组成，握有收税、征兵、媾和等重权，是“王”的顾问，又是人民大会各项决定的预决机构。“王”则由选举产生，主要是军事首长、最高祭司和审理某些案件的审判长。到了罗马共和国时期，古罗马的奴隶制民主管理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平民奋起争取民主权利。共和国设平民保民官，对元老院及高级长官凡是损害平民利益的决议，均可行使否决权。到后来，又用法律保证平民可以进入最高权势者行列。公元前4世纪中期起，先后有平民任独裁官、监察官、大法官，罗马市政司、财政司职位也都有平民担任，旧的贵族特权逐步被取消。

与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主民主管理机制相比，中国奴隶社会没有产生和形成政治管理体制上较成熟的权力制衡系统与形式上的民主管理机制。尽管西周朝时期实施过分封制，“周天子八百诸侯”，并留下了《周礼》这部古代管理思想的精华，尽管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辉煌时期，诸子百家纷纷提出了治理国家的思想与观点，但在对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制约以及广泛动员公民参与社会管理事务方面，中国奴隶社会没有在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留下相关文化遗产，遗留下来的只有大量维护奴隶主专制统治的思想。

（二）西欧封建社会经历的分权经济、城市自治与法制管理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缺乏的

西欧封建社会的发展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①以采邑制为基本制度的分权经济；②封建城市的自治管理与国王之间的分庭抗礼；③除英法两国外，大量非统一的分散的封建小公国的存在。

所谓采邑制是指以土地为基础的封建经济制度，即封建国王将其所有的土地分给各个封建领主贵族，由其实际占有的一种封建土地制度。采邑就是封地。国王在战争中将土地分封给各部落酋长，酋长又将土地分封给追随自己的人。层层分封形成从小到大的领主与附庸关系。采邑有大有小，一个采邑就是一个封地，或是一个庄园，或是一个城堡，国王与采邑主（领主）之间的权力、利益、责任

关系用法律契约规定下来，双方都要遵守。按照法律规定，各个采邑主（庄园主）拥有政治权，即管理本采邑内一切政治事务的决策权、行政执行权；有司法权，即在本采邑内制定法律，并设立司法机关执行法律；有经济权，即收纳赋税、铸造货币、调动与配置经济资源的权力；有武装权，即设立军队的权力。采邑制这种分权经济使各个分散的封建领主都拥有反抗国王的实力，也拥有反抗封建国王的权力。相反，中国封建社会是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并建立起中央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后，皇权便高于一切，不受任何法律与公民的监督。西汉成立之初也曾实行过分封制，但因其产生了巨大弊病，很快被废弃了。

城市自治也是西欧封建社会的一大特色。西欧各国在进入封建社会后，城市多是手工业与商业中心，大量的自由民、小手工业者、商人在城市聚集，形成了与中国封建城市不同的市民结构。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城市不完全是从奴隶制时代的城市和城都继承下来的，许多是10世纪到11世纪时由逃亡农奴重新组成的。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① 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发展迅速，多产生在封建领主城堡周围或宗教寺院周围，一开始便形成了与封建领主割据势力的对抗，城市市民争取城市自治的运动便随之产生。在意大利、法国、英国，新兴工商业城市的市民在斗争中结成公社，以赎买或武装斗争的方式与封建领主、封建国王和政教合一的教会作斗争，以取得城市自治权。在意大利南部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取得完全自治的城市，由市民选举议会，议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有权制定政策、法令和铸造货币与组织武装，有权宣战、媾和；这些城市通过选举产生市长、法官，任命行政、司法、财政官员。而在法国、英国的一些不完全自治的城市，则由国王与城市代表按照协议共同管理城市。^② 相反，中国封建城市是封建专制的统治中心，不可能形成由市民参与以工商业为主的自治管理模式，更不可能成为反对封建势力的中心，也就不能留下城市自治、法治、民主管理、分权等文化遗产。

封建小公国在历史上的存在，也是西欧封建制的重要文化遗产。除英国和法国外，西班牙、荷兰、葡萄牙、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长期保持着一个个小小的封建公国，有的是在封建采邑制领主基础上形成的，有的是在反抗伊斯兰教统治的斗争中形成的，如11世纪前半期西班牙就形成了雷翁、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3。

^② 刘明翰：《世界通史：中世纪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7-52。

斯提、纳瓦尔、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王国等几个国家。直到15世纪末,在伊莎贝娜女王的努力下,西班牙才在资本主义萌芽的过程中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荷兰作为早期崛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最初国内各省都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力,包括各自实施不同的币制。德国也是如此,公元12世纪到15世纪进入封建社会后,帝国实质是封建领地集合体,帝国皇帝徒有虚名,多数城市形成了各自为政的诸侯割据势力,各地的封建公爵、诸侯权势很大。由于无法实现真正的中央集权,德国各地城市之间被迫按地区互相结盟,以保卫自身的利益与贸易通道,如德国北部的“汉萨同盟”,莱茵河畔城市的“莱茵同盟”,德国南部城市的“士瓦本同盟”。意大利在摆脱罗马帝国的统治进入封建社会后,国家仍处于分裂的局面,出现了一个个的城市共和国,如威尼斯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等。13世纪到15世纪是意大利城市共和国最繁荣的时期。在城市共和国的管理架构中,有法律确立的最高立法监察机关大议会,有掌握行政大权的元老院或长老会议,有各行会等经济组织,城市共和国完全实行自治。法国也经历了长时间的封建割据,15世纪下半叶才在路易十一的努力下形成封建统一集权的国家。英国在15世纪下半叶结束了国内的内战,形成一个封建王权集中的民族国家。

与西欧封建社会的发展相比,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是一种超稳定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一次次被推翻,又一次次被复制和强化,即使在短暂的国家分裂期间,也并未在理论与实践上留下城市自治、分权经济、民主与法治的文化遗产。相反,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人治、官本位、封建特权等思想与价值体系作为主流精神遗产一直延续下来。近代中国由于未经历过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及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冲击,也未经历类似意大利文艺复兴那样的文化革命,未能对封建专制的宗法思想、封建特权、官本位、人治等观念进行彻底洗刷与冲击。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畸形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政治制度及其思想体系未有任何变化而被承袭下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是赶跑了一个皇帝,推翻了帝制,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未对封建主义思想进行系统的批判与清理。其后不久,跳梁小丑袁世凯、张勋还上演过复辟闹剧。同时,中国几千年“亚细亚”的封建生产方式源远流长,没有形成强大的城市市民阶层。据统计,1949年前旧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几乎占整个社会经济的90%,封建小农经济思想根深蒂固,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没有力量超越政治上的皇权主义和经济上的绝对平均主义,只能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好皇帝的身上。这种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正如马克

思论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停滞的、非辩证发展的、特殊的、有局限性的、缺乏社会变革的机制，因此尽管王朝不断更替，封建皇帝换来换去，但社会内部结构始终停滞不前。在这种背景下，各种封建残余思想使我国社会背上了十分沉重的历史思想包袱。

正因为如此，中国是世界上封建专制历史最长、封建专制思想影响最深的一个人口大国，封建思想的历史包袱也最重。正如邓小平同志在 1980 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中指出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封建残余思想又特别容易被人贴上时髦的标签而招摇过市，影响人的思想，扭曲人的心灵。“文革”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原因之一就是封建残余思想为林彪、江青一伙所利用。此外，从世界范围来看，个别经济落后国家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却不能有效地摆脱某些封建专制残余思想的影响，给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带来深重的灾难，对此我们应引以为戒。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和深化改革的今天，我们要特别警惕封建残余思想的复活，防止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威胁，成为扭曲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的精神枷锁。

二、破除封建残余思想，重点要冲破特权观念、官本位思想、人治意识的束缚

封建残余思想在我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目前影响我国社会和谐和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封建残余观念，应重点突破这些思想束缚，才能使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实。

（一）突破封建特权观念的束缚，真正确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平等观念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更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要素。机会公平、竞争公平是市场经济的题中之意。发展市场经济要求在横向的经济关系中、经济主体之间、人与人之间保持地位平等，等价交换，自由买卖，平等竞争。正如马克思所言“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平等理念正是现代市场经济最基础的理念。

^①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92.

平等理念也是现代技术进步条件下人与人之间关系发展的新要求。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网络成为人与人之间新的联系媒介,在网络面前人与人平等、互动,过去那种垂直的纵向科层的金字塔式的人际组织关系正被横向联系、人人平等的扁平式的人际关系所取代。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民主参与意识、平等意识更多地依赖新技术革命这一物质基础。尼泊尔这样一个坚持了几百年君主制的封建王朝没有响起一枪一炮而突然倒塌,从封建帝制社会迅速进入了公民参与的民主社会便体现了这一特点。

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有的人总想维持原有封建残余的旧特权,并且还在不断制造新的特权,这些是逆反现代技术进步客观规律的。从世界范围考察,凡是经济落后且奴隶制、封建专制残余严重的国家,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极易出现特权思想泛滥而破坏平等市场竞争的现象。搞特权的实质是将人的政治地位及生活待遇、社会待遇分为三六九等,破坏平等,使一部分人即特权阶层享有法律和制度之外的特殊权利,或者用制度、政策将某部分人的特殊权利、特殊待遇、特殊利益固化下来。例如中国公务员离退休制度中关于高干离退休后的某些待遇规定就值得探讨。我们不应该无休止地复制某些特权而不做改革,应当认真研究这方面的改革:对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可继续保留现有某些特殊待遇;对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工作的高级干部则可用货币化的手段提高其退休待遇,改变新一代高级干部退休后仍占用各种非货币资源的传统做法。这种改革对于帮助年轻一代干部抛弃特权观念、树立公仆意识非常重要。又如中国党政机关的公车配置与使用制度的改革早已酝酿多年,并有局部的试点经验,但由于特权观念的影响及既得利益团体阻碍等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有效实施,公车私有、私用的情况越来越严重。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不是主张取消党政机关的公务用车,而是主张改革传统的公用小车管理制度。在建设和谐社会、强调“节能减排”的新形势下,政府机关如能在公车使用与管理上带头改革,为节省能源与缓解城市交通状况尽其所能,无疑会为老百姓积极参与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示范与激励。

特权在经济领域的一个突出危害就是形成了各种非正常的垄断,如某些产业的经营垄断、某些重要资源配置与转让的垄断、某些就业机会与干部升迁机会的垄断,严重破坏了机会公平、就业公平、市场公平、创业公平,加剧了社会阶层之间、居民之间财富及收入分配差距的非正常扩大。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多,社会滋生了越来越多的特权要求及特权攀比意识,有些领导干部甚至以拥有某些特权为荣。仅以军车牌照这一

小事为例。军车牌照本是为军队执行特殊任务设立的，但有的地方干部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也以弄到军车牌照为荣。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谈话中所讲的：“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干部队伍发生腐化。”“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①邓小平同志还对高级干部所到之处“或则迎送吃喝，或则封锁交通，或则大肆宣扬”提出了批评，强调这种事情“从中央到各级不许再做了”。^②但时下这种警车开道、封锁交通的现象依然存在。总之，追求制度法律监管以外的种种特殊权利，追求一般公民无法享受到的特殊待遇、特殊机遇、特殊资源，或者将某种不平等的、不公正的特殊权利及待遇制度化，已成为目前影响中国社会和谐的一个突出问题。同时，由于腐败的泛滥，还出现了用金钱购买与交换某些工作特权、岗位特权的倾向，这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新障碍。

（二）突破“官本位”思想，树立现代市场经济民本位意识与观念

崇尚权力，重官轻民，这是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核心。官本位的实质是官民关系颠倒，突出的是以官为核心的价值理念。这几年来，某些地区和领域官本位的思想在泛化，想方设法做官、升官、买官、结交官成为逆反市场经济的一种常见现象，官商不分、官商合谋、以官助商、权钱交易成为影响市场与社会和谐的毒瘤。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体制并存的特殊时期，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和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党政机构膨胀、官员数量庞大已成为一种严重弊端。在党政机构、官员数量扩大的同时，管理效率却未得到明显的改善，在某些豪华的政府办公大楼、大院崛起的同时，老百姓进门难、办事难的情况依然存在。官本位思想还在向社会许多非政府机构扩散，学校行政化、企业行政化、中介服务单位行政化、事业单位行政化越来越普遍。

“官本位”思想在实际生活中扭曲了现代市场经济下的官民关系，扭曲了公务员与纳税人的关系。看官员眼色行事、凭官员批示办事、靠官员关系成事，以及下级对上级负责、小官对大官负责成了某些人奉行的潜规则。更为可怕的是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各种带有封建残余影响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蔓延，干部队伍中

^① 邓小平.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82.

^② 邓小平.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90.

形成了某些封建裙带、帮派、山头、圈子，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官官相护。已公开披露的某些腐败“窝案”就说明了这一点，广西、山西等地相继出现的瞒报重大矿难事故也说明了官官相护的危害。如果这样下去，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就会变成一句空话，“为老百姓办事、对人民负责”只会成为某些官员的一种口头敷衍。

更令人忧虑的是时下的官本位思想正演化成一种潜在的“权力拜物教”文化，严重地侵蚀知识分子群体。知识分子趋向权贵化的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权力拜物教”正在侵蚀高等学府、科研院所这些圣洁的知识殿堂，权钱交易、权学交易在泛滥，急功近利、依攀权贵、结交豪门正成为某些知识分子头面人物的时尚，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良知和追求真理的自由精神在沦丧和变异，投机钻营的权谋之术与官场黑厚学充斥某些校园，不顾礼义廉耻、不敬畏天地鬼神的“痞子文化”心理左右了某些知识分子，“权力拜物教”与“金钱拜物教”融为一体，使高等学府也有些狂躁和不安。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授发出的“变革时代的大学呼唤校园的宁静”呼声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发展市场经济必须牢固树立民本位意识，也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讲的“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时刻牢记人民是官员和政党的衣食父母，两者关系不能颠倒。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封建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搞人治尚且知道君民关系是“舟与水”的关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其宗旨。邓小平同志讲“我是人民的儿子”，强调的就是民本意识。为悼念四川汶川 5.12 大地震的死难同胞，国务院确定 2008 年 5 月 19 日至 5 月 21 日为全国哀悼日，各地半降国旗，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全国人民一道在同一时间为遇难同胞默哀三分钟。这是新中国举行的第一次举国尊重公民生命的仪式，以一种制度创新的严肃方式体现了以人为本、以民为重的科学发展观和民本位意识。它注定会在中国现代民主建设征途中留下一座伟大丰碑，彰显人性、人道、人本的理性之光。

发展市场经济，最根本的是要调动社会公民创业、创新的激情与能力，使所有平等的经济主体在有序的市场竞争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创造价值、创造财富的潜能。企业本位与公民本位是一种历史潮流，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题中之意。官与民的关系不能本末倒置。批判和肃清官本位的价值理念及思想影响是我们长期都要注意的。

（三）破除封建“人治”意识，树立现代市场经济“法治”理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就提出了建设民主法治国家的主张，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民主法制的进程。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依法保护产权，依法保护经济主体公平竞争、自由贸易、等价交换的法制经济，但由于几千年封建集权的残余思想的影响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高度集中，我国“人治”思想根深蒂固，影响市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人治思想的实质是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和制度对权力无法实施有效的制衡与监督。人治的特征是以权限的大小来决定资源配置的力度和范围。封建社会皇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监督，可调动天下一切资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帝制被推翻以后，皇权思想演化为“一把手”决定一切事务。目前社会广泛流传的“老大”、“老板”、“头”便是对“一把手”的一些别称，这些称谓的广为流传也表明了权力集中于“一把手”的现实。邓小平同志1980年就批评过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①我国已查处的许多腐败大案表明，权力集中而又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衡往往是造成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采取的是体制外的放权让利的渐进式改革，中央扩大了各级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事务中的决策权、控制权等。这一措施在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的同时，强化了权力本位的人治思想。在实际生活中，按领导批示、批文办事，靠开会传达领导人讲话推动工作是很常见的，法律条文反而可能被置之脑后。按管理职责及规章制度应该主动办的事情，因无领导批示或讲话，便可视而不见，或拖着不办；或者是领导批来批去，会议议来议去，各部门转来转去，最后还是无法落实。现实生活中，有些基层政府及办事机构本该给老百姓认真办好的事没有及时解决，老百姓只好层层上访，往上面找领导批示或要一个说法，于是形成了独特的“上访文化”与“批示经济”。这与封建社会的“拦轿告状”是一脉相承的，是“人治思想”、“清官文化”的表现。这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影响了社会和谐。必须破除人治意识，牢固树立法治思想，崇尚法制。

除了特权观念、官本位思想、人治意识等封建残余影响外，影响和阻碍市场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90。

经济健康发展的还有封建自然经济的轻商和抑商思想、封建家长制、“宁作鸡头不作风尾”的轻视和排斥社会分工协作的思想，以及封闭的“小而全”思想与画地为牢的封建割据思想残余等，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详述。

三、完整准确地领会邓小平同志关于 “肃清封建残余影响”的思想，在制度 创新中推进现代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一）肃清封建残余影响是一场长期的思想教育与思想解放

一方面，在中国，肃清封建残余影响具有广泛性、长期性。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8月18日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我国封建残余的影响很广泛。除了他讲话中提到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家长制以外，邓小平同志还指出，“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不止这些。还有，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部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淡薄；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与作风……等等。”^①邓小平同志对封建残余影响在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广泛存在是十分清楚的，也知道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是轻而易举的，“还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②邓小平同志还指出肃清封建残余的影响在中国具有长期性。在1980年8月18日的重要讲话中，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③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论述深刻地表明，用军事手段和政治手段推翻封建统治和瓦解封建经济制度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但要在思想上肃清封建残余的影响必须要经历更长的时间。文章前面已经论述过中国封建社会留下的民主、法治的精神遗产少，人治的遗产多，因此，肃

①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94.

②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95.

③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95.

清封建残余影响具有长期性。

另一方面，正因为中国肃清封建残余影响具有广泛性、长期性，因而不应当奢望搞一两次运动就大功告成，而要注重长期的思想教育与思想解放。这是邓小平关于肃清封建残余影响思想的一个重要战略观点。在1980年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指出，“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来说，是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是为了从封建主义遗毒中摆脱出来，解放思想，提高觉悟，努力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努力为人民作贡献，为社会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①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论述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肃清封建残余影响不是整人，而是为了解放人的心灵，提高人的觉悟与思想水平，真正使每个干部群众的思想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物质生活的现代化，作一个健全的现代人。这与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是高度一致的。邓小平在这一重要讲话中特别告诫我们，肃清封建残余影响“必须明确，不要搞什么反封建主义的政治运动和宣传活动，不要对什么人搞过去那种政治批判，更不能把斗争矛头对着干部和群众”。^②这就表明肃清封建残余影响不能重复历史上“左”的错误和传统的运动式办法，只能是开展长期思想教育与思想解放。只有这样，才能收到实效，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

（二）把肃清封建残余影响与批判其他错误思想有机结合起来

在1980年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中，邓小平同志又深刻指出，“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我国经历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思想同时也同资本主义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互相渗透结合在一起。由于近年国际交往增多，受到外国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生活方式影响而产生的崇洋媚外的现象，现在已经出现，今后还会增多。这是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③邓小平这一论断说明，对一种错误思想的批判不能代替对另一种错误思想的批判，思想批判不具有经济学上的产品功能替代效应；同时，批判一种错误思想更不是肯定另一种错误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残余绝不是肯定和宣扬资本主义思想。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历史悠久，

①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95—296.

②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96.

③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96.